

中国高校百部优秀社科专著文库

中日关系史论

■ 王铁钧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日本学研究续笔

中日关系史论

王铁钧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关系史论/王铁钧 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2

(中国高校百部优秀社科专著文库/樊景良 主编)

ISBN 7-5034-1612-2

I. 中… II. 王… III. 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1624 号

责任编辑: 刘 剑

封面设计: 张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 110113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字数: 228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20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	(19)
一、中日关系史探源	(19)
第二章 汉、魏时期	(33)
一、政治博弈中的利益选择	(33)
二、“生口”考	(50)
三、“朝贡贸易”辨	(67)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	(91)
一、册封与东北亚政治格局中的日本	(91)
第四章 隋朝	(125)
一、圣德太子的大陆情结	(125)
第五章 唐朝	(153)
一、遣唐使的文化角色探实	(153)
二、析史笔日本考语之流变	(162)
三、问遣唐使所为何来	(173)
四、王仁与汉籍东传考	(189)
五、人间异数与异国风流	(212)
六、后遣唐使时代述论	(219)
七、李唐王朝中日关系述评	(235)

第六章 宋朝	(247)
一、日本僧人与跨文化传通	(247)
二、宋代日本对华贸易述略	(256)
第七章 元朝	(282)
一、元师何以寇日	(282)
二、对抗中的妥协	(298)
第八章 明朝	(321)
一、勘合贸易与倭患东南	(321)
附 录	(353)
一、中国正史(日本传)选	(353)
二、主要参考书目	(396)

绪 言

—

如果两汉以来见诸正史的（日本传）另当别论的话，那么，有关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到明代中期以后，更准确的讲，则是倭患当獗的嘉靖年间才见端倪。但事实上嘉靖年间刊行的相关著述，如薛俊的《日本考略》、郑若曾的《日本图纂》及《筹海图编》^①，以及万历年间行世的，如李言恭与郝杰的《日本考》、^② 郑舜功的《日本一鉴》、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都是因为明中叶以后倭寇侵扰日甚，东南半壁尽受荼毒，防倭抗倭已成关乎社稷安危的军国第一要事，正是出于国家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才编撰的。以上撰著以介绍日本的山川地理、风土世

① 有关《筹海图编》的编纂者各说不一。嘉靖与隆庆年间的刊行本称郑若曾，万历以后的刊本则记作胡宗宪辑议，《四库全书》亦作胡宗宪，实误。

② 另有一名，曰《日本风土记》，作者为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在当时是作为《两浙兵制考》的附录。《日本风土记》与《日本考》，二者的内容、版式和字体完全一样，仅是署名和书名不同而已。有关二者的考据，见汪向荣的《关于〈日本考〉》，载《日本考》，中华书局，1982，第22页。

情、社会政制等为主，“以便御边将士之忠于谋国者究览”。^①这一类的著述重点在于相关日本信息的收集与公表，可以说更多的是出于实用和功利的目的。在当时，人们尚无暇顾及，似乎也没有兴趣就两国关系的历史经纬给予评说。

事实上，就当时的氛围而言，由于倭患猖獗致使元代以来已是淡漠非常的双边关系更趋紧张，朝野上下对日本俱无好感可言，甚至可以说是咬牙切齿，有论及中日关系的，亦是言辞激切者多。如明人殷都的《日本犯华考》^②，名为“考”，上阙其实不过是以往见诸正史的日本迹录再被旧话重叙；随后笔锋急转直下，痛斥倭寇自“洪武中，数为边患”的斑斑罪迹及其来犯所经路线、季节月份，最后则是不着边际的“多延智士，间其所亲，时出哨洋，扰其登岸；厚赏将士，敦其敢勇，倭纵狡悍，必不能持久，岙中以自老死，其成擒必矣”如此这般的防御之策。通篇述来火气十足，情绪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如“其人凶狡无信”的考语，就今天来看，实不无民族成见和偏见掺杂其中。若是专指作奸犯科的日本不法商人乃至烧杀虏掠的倭寇一族则无可，但作为对扶桑东邻国民性的一种评断则大谬不然。

尽管就当时而论，这不足为怪亦不足为奇，只因倭患贻害，江、浙、闽、粤民生凋敝已极，朝廷亦因之帑藏空虚以致国本动摇，家国之恨能不切乎？但就史论而言，则不足与闻亦不足与论。何况亦不知此公何“考”之有。《日本犯华考》未滿千字，转录者十有七、八，除将见之正史的（日本传）掐头去尾，断章截句外，余下的则多是转录明代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如果说有“考”的话，那也是越考越让人一头雾水，如“（明）永乐以来，国王嗣立，皆受本朝册封”，实不知这“皆”字何来之

① 语出《日本考略》之《作者自序》。

② 见《倭变事略》，上海书店印行，1982，第167-168页。

有；又称永乐朝时日本尚是“附庸之国百余”，如此述笔能不混淆视听，乱言惑众？虽然笔者所撰惟是《日本犯华考》一篇，但有明一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却由此可知一斑。

二

到了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只因国力此消彼长，中日双方彼此的观感及相互间的关系已大异以往。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自是一番新局面，有关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亦有理由水涨船高。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瞩目日本的新变革并注目中日关系的新变局者甚众，相关日本的著述亦不少。最早见的乃是曾随船到过日本长崎的画师汪鹏著于1764年的《袖海篇》，汪鹏对日本多有褒美之辞，称其“风土甚佳，山辉川媚，人之聪慧不亚于中华儿女。”^①。之后有戴名世的《日本风土记》、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翁广平的《吾镜补》。鸦片战争之后更有福建巡抚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0卷、魏源的《海国图志》、浙江海关文案李圭的《环球地球新录》中的《东行日记》1卷、广西巡抚王之春的《谈瀛录》、被确认为乃是曾任江西吉安同知的李筱圃所作的《日本纪游》、公元1884—1887年驻日使馆随员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时任兵部郎中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30卷，还有与傅云龙一起受派出洋考察的刑部主事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等。

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黄遵宪所撰著的《日本国志》。《日本国志》计40卷50万言——仅此即可见其分量。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经传世即赞声不绝并至今日，早的有公元1896年梁启超为《日本国志》所作的序言：“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慙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

① 见汪鹏《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帖之《袖海篇》。

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①近的则有 20 世纪 90 年代付梓的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称其为“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集大成者”及“近代对日研究的代表作”。^②

应该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不仅拓宽国人认识日本的视界，而且纠正了许多旧史沿袭下来的不实之辞与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言。近代以来国人对日本相对清晰和不失真的印象获得，应该说，这有黄遵宪《日本国志》的一份功劳。张之洞誉之为出使日本者案头必备之书；20 世纪 20 年代风靡一时的戴季陶的《日本论》，也将其推为留日学生得于了解日本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书籍，曰：“十万留日学生了解日本主要靠的就是三十年前黄公度的《日本国志》一书。”《日本国志》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

但是，包括《日本国志》在内的清代诸多著述，仅就以上所见的各书书名即可知俱是以介绍日本为主。一是清中期以降，尤其是 19 世纪后期，中日两国均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和社会变革。公元 1868 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封建主义桎梏并迅速发展了近代资本主义，至 19 世纪末，日本就已成功地从原先落后的

① 黄遵宪字公度，故梁启超有“黄子公度”之称呼。所谓的“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可有二解。一是黄遵宪前后花费近十年时间才完成这部 45 卷 50 万字的巨著；二是《日本国志》的出版问世颇费周折，书稿先是光绪 16 年（1890 年）交付广州富文轩，却迟迟没能刻印，拖至光绪 21 年（1895 年）才得于付梓，即称为“光绪 16 年羊城富文斋刊本”的《日本国志》最早的刻本，此时离黄遵宪该书稿的杀青又将近十年之久。后黄遵宪又对《日本国志》加于修改，增删数千字，撤去原书中的李鸿章的批文及张之洞的咨文，加上梁启超写的后序并于光绪 24 年（1898 年）出改刻本。

②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第 199 页。

封建制国家转型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经历了江户时代二百多年的锁国已是暮气沉沉的东方民族转眼间却变得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相形之下，曾经鼎盛一时的中华帝国却已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匪夷所思历史变迁与国力此消彼长的强烈反差迫使国人无奈地承认日本已昂首阔步地走在我们前面，从而不能不面对日本的辉煌反躬自省。人们在卧薪尝胆的同时也在注目着日本，希冀这个东瀛岛国近半个世纪的改弦更张能对现实中国之改造有所启迪和借鉴。

凡此相关著述对日本的娓娓道来，其实正是在寻找，同时也是在思考中国与日本此消彼长的原委所在，这在当时是最紧迫和最重要的。至于中日关系历史脉络的梳理及探析双方历史上外交博弈的利害得失和利益取舍，坦言之，尚不是时候亦不合时宜。

同样是出于功利的考虑，人们此时正在思索的，也最感兴趣的是眼前的日本向已是风雨飘摇的中华帝国展示了什么、证明了什么，中国又被眼前的日本教训了什么而且还将被教训什么。至于对现实中国之改造似无直接意义和作用的两国通交的历史反思则不甚在意，即便有其述笔，亦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简言之，仅是止于就事论事的历史追述和回溯。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比之从历史的思辨中获取教益，从直观的现实里吸取教训更直截了当，也更刻骨铭心。

若说中国对海东日本的了解到了明代尚是“海外远夷，招车罕至，往来者皆商贾之流，无由探悉其原委耳”，^①那么，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双边往来已无不便可言。清代日本研究的相关著述，撰著者悉数到过日本，对日本亲眼所见的结果便是对历代史籍（日本传）的诸多讹夺与谬误的啼笑皆非。再比较日本方面此时对中国甚是了然于胸，而中国却对彼邦知之甚少乃至孤陋寡

^① 语出徐继畲《瀛环志略》卷1。

闻，且不实传闻者不少，^①那就更是痛心疾首。

黄遵宪记道：“余观日本士大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于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②并有“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的感叹。^③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撰述《日本国志》的一方面原因，他说：“《山海经》已述倭国事，而历代史志，于舆地风土，十不一真。……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噱，余甚可惜之。”^④王韬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所作的序亦云：“彼中书籍，谈我国之土风、俗尚、物产、民情、山川之诡异、政事之沿革，有如烛照犀燃。而我中国文士所撰述，上至正史，下至稗官，往往语焉而不详，袭谬承讹，未衷诸实，窃叹好事者之难其人也。”^⑤

显然，当时中国文士的日本述笔多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和动机的。一是拨乱反正，在拓宽日本视界的同时也消祛前朝旧代相关日本述笔的不实之辞乃至怪异的天方夜谭，还日本予真实的面目；二是也为中华文士争个面子，就相互了解及文字记载的准确

① 直到明后期的日本研究的著述依旧是讹误不少，如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疆域）照旧是“……广袤四面，各数千里也。东北山外历毛人国至文身国，约七千里。南到侏儒国，约四千里”。姑且不说这“侏儒国”纯属子虚乌有，就“广袤四面，各数千里”一说，在今天看来亦是天方夜谭。照其说，日本的版图就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弓状形而是方形或圆形，不能不说是错得离谱。

② 见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序》。

③ 见黄遵宪《入境庐诗草》卷3之《近世爱国志士歌》。

④ 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

⑤ 见王韬《日本杂事诗序》。

与精确而论，两相比较，确实与彼邦相去甚远。对以经史之学为学问之正宗并以治学、治史严谨为本旨亦为传统的中国来说，这不能不说是颜面丢尽。人们尽可以坦承日本因师法西洋而在社会发展方面超越了中国，但绝不可能在学问与学术方面自弗不如。惟是拨乱反正，以正视听才有中国文士，也才有中国经史之学的尊严可言。知耻而后勇，又能不勉力为之乎？

正因为如此，虽说有清一代对日本的研究盛况空前，但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却未见成比例的水涨船高。尽管不能说它遗漏在当时对日本瞩目且悉心用笔者的视野之外，但功利的驱使令人们更对现实的日本和既今的中日关系感兴趣。换言之，人们更为关注的，也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与日本的现在时和将来时而非它的过去式。与明代后期一样，清代兴盛于鸦片战争之后的日本研究亦是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变革时期。尽管人们的思想不失深邃，但时代的浮躁却使人们更乐于在现实中解惑而非静下心之后的理性思辨。显然，要与历史对话尚需时日。

三

进入 20 世纪以后，应该说与历史对话的语境已经形成。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留日学生的纷纷归来与胡适、王国维等人推崇的考据之风的兴盛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遗憾的是先有 30 年代的救亡运动，后又是长达 8 年的抗日战争。“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家国尚且不保，研究又从何谈起？更为可惜的是，一场抗日战争将原先的留日学生分为势同水火的两大阵营，战争的结局致使诸多学界精英终为千夫所指，被斥为汉奸卖国贼而沦为阶下囚。虽然像周作人、钱稻荪者并未就此销声匿迹，但事实证明后来他们在学术方面亦难有作为。究其竟，政治生命的断送事实上也意味着他们学术生命的终结，做人不能不惶惶然且慄慄然，究其竟，底气不足

又何敢高谈阔论亦何能振聋发聩？此乃原因一；第二，“文如其人”已成金科玉律，政治上的斑斑污渍不仅使其人格蒙羞，同样的也使其失去了在学界的话语权。修修补补拾拾掇掇尚可，但是要想述“论”则难矣，原因依然在于底气不足。其“论”不足与闻是必定的，更不要说还有文字狱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故为明哲保身计，在夹着尾巴做人的状态下，学术上最多也就是搞搞翻译而已，在研究方面已难奢望其再能有丰硕的成果，事实亦是如此。

至于胜利者阵营的一方又如何？对部分人来说也许是无奈的选择，但已成现实的从政生涯决定了这些人已无暇，也无兴趣再去搞学术，做学问。何况血与火的战争现实使劫后余生者对日本有着何其丰富的感性认识，对他们来说，这场侵略战争的本身就是中日关系史最直接的，也是最直观的阐论，有其足矣！他们中的多数不屑再去钻故纸堆，对不带民族成见的理性思辨似乎也不以为然。不知这场战争之后麦田的守望者还有几多，总之，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在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研究一直是波澜不惊。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前，就大陆中国而言，这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表面上的政治大一统局面造成的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但是家国不幸却也未必诗家幸，舞文弄墨者亦是免不了大遭其殃，惶惶如丧家之犬，与日本相关的学术研究亦是因之处于寒冬状态。仅看搞日本文学的就很清楚学界的经营之惨淡，当时鼓捣来鼓捣去的主要也就是日本30年代普罗作家的那一群，尤以小林多喜二为最。此时要想不受政治功利的驱使以史为识、以史论史，那谈何容易。不能说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乏人，只能说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曲笔者多，直言者少。已沦为政治工具，为政治所奴役着的学术研究又能有多少真知灼见可言？因此，这二十年的日本研究多是“捣糨糊”也就不足为奇。

70年代开始，中国的日本研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先是70年代初期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双方，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进入并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的重修旧好之后的蜜月。回溯历史以证明双方无不难以割舍的历史情缘已成时尚，这既合当时政治的需要，也不失为“中日友好源远流长”的有力脚注。情势使然，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自是形势喜人。

随后进入80年代，一方面是国家开放改革，不仅经济活力渐显，政治舆论方面也有所宽松，已非万马齐喑的既往年代可同日而语。至少在学术研究方面大致可各抒己见，大可不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防范，以免为文字狱所加害。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实事求是地讲，书斋式、学者式的学问研究尽可为之，大可不必跟着政治舆论的风向转，亦可不必担心为政治功利所左右。故相关述笔尽可言无不尽而不必藏头缩尾，读来酣畅淋漓且有真知灼见的撰述时有所见。

另一方面，随着中日双方文化学术交流日盛，日本方面在该领域的研究着实令国内学人汗颜。尽管两国学者的研究手段、论证方式，以及视角都不尽相同，但坦率的说，自近代以来，我们自己尚不见有堪称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专著，更不用说鸿篇巨制。日本方面，仅就一部现代人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就足以说明问题。^①这部撰写于二战期间的著述，^②虽然在今天看来，作者的一些观点已是陈旧，某些阐论亦不能苟同，但乃至今日，包括笔者在内，诸多研究者还不时引用它的文字和数字，足见其分量之重。差距的存在令中国学人不能不如芒刺在背，亦

① 原书名为《日华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② 作者木宫泰彦在《著者序》中称该书脱稿于1943年，1945年3月，眼看就要出版，偏偏赶上东京大空袭，印刷厂不幸焚毁，原稿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后又经十年笔耕，依次整理囊篋资料，终于完成此书。

不能不扬鞭奋马，其景其情犹如晚清时期的中华文士面对“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噓”时的尴尬和奋起。^①托庇于天时，十年磨剑，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已渐入佳境，时见有精辟的述笔，有些撰著对彼邦人士悖论的反驳甚是鞭辟入里，读来拍案叫绝。水到终于渠成，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到了今天已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可言。

四

纵观我国学界之中日关系史研究，大致有这样的印象和感想。

一、考据或实证者多。

这既是中国史学研究传统手段的因袭，同时也受到彼邦实证式研究风格的影响。应该说，在复原并清晰中日双方往来的历史图象方面，如此形式的研究所作贡献最大。史料的诸多阙失与讹误，正是多亏这种考据或实证而补实，且得于辨误、纠误并致疑云消散。若非如此，历代典籍日本撰述的诸多谬误还将以讹传讹，谬种流传，还将混淆视听；若非如此，相关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述笔又怎可能凿凿有据？若非如此，所谓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也就是空中楼阁，供作论据的诸多史料依旧是真伪莫知，虚实难辨，令人如坠五里云中，不知其然。

但是，笔者在承认这种考证式和实证式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同时，却也不得不指出，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姑且不说有些撰述虽是洋洋洒洒，看似旁引博征，实则玩的是蚂蚁搬家的游戏。其所引用的史料不可谓不多，甚至有堆砌之嫌，但却是有述无论，不知其所证论者。即便是中规中矩的述论兼济、史论兼济

^① 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

的撰著，也总感到意在还原某一历史画面、澄清某一历史真相的多，而对每一历史时期中日关系的既存形式进行梳理的少。

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往来，彼此双方各有各的意图，各有各的动机，各有各的利益立场，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中国正史（日本传）最早的《汉书》卷28（地理志·燕地）记载的倭人“以岁时来献见”，它毕竟不同于今人的亲戚串门，也迥异于今天的出国旅游。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早期，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的日本先民何以冒九死一生之险跨海前来献贡？其所为何来？献贡的目的何在？献贡是一种表面文章，其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献贡实际上是古代外交博弈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外交博弈中，双方又是如何衡量自身的利害得失、坚持自己的利益选择并进行彼此的利益交换？凡此，皆值得探讨。

如果说，在这之前我们的研究成果已能向人们展示一幅大致清晰的中日交往的历史画面和勾勒一条并不模糊的双边往来的历史轨迹，那么，我们所欠缺的恰恰就是阐释这幅画面之所以图形如此的原委和这条历史轨迹各个节点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之前的研究所欠缺的，也是我们今天的研究需要努力的。

二、这之前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等同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严格的说，这并无所谓错。事实上，剔除了文化交流的部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通交虽不能说是就空白一片，但绝对是黯然失色。毕竟，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上占有显眼的位置并被视为意义重大，尤其是对日本而言。故这之前的诸多撰述，不管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以文化交流为主题或主线而展开。就人情与世情而论，也确实是文化交流的这一乐章最为动听，也最为抒情。特别是近代以来可让双方莺梦重温的几近于无，对中国来说，更可以说是噩梦不断，这就使人们对历史的过去那弥足珍贵的记忆尤为偏重乃至偏爱，这不难理解，也完全可以接受，更不应该嗤之以鼻。

但是，笔者却也发现，不仅仅是诸多研究者热中于对古代中日双方文化交流的铺叙，在论述或追溯中国与日本双方历史往来的时候，有意无意的，人们总是过于强调历史事件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事实上这反映了当今学界的一种倾向，即过分的夸大文化在中国与日本历史交往中的作用及其意义，从而也过分的夸张古代日本对海外先进文化的诉求。

笔者并不否认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的先进文化甚为景仰且努力摄取之；笔者也无意抹杀历史上前来朝觐献贡的日本使节，也包括遣唐使对古代日本文化的建构所作的重大贡献，但必须强调一点：日本在历史上固然表现出对大陆文化尊崇的一面，但在其与大陆中国的交往中，文化的摄取却是次元的、从属的、第二义的。换言之，日本在与中国的历史交往中，其首先着眼和主要考量的是政治利益而非文化摄取。不认识到这一点，则必然过于浪漫的看待中日双方的历史交往及文化交流，自然也就过于天真的看待日本在亚洲历史中的政治角逐及与大陆中原王朝的外交博弈。

五

遗憾的是，一种假象已然形成，似乎古代日本与中国的交好就为的是摄取大陆中国的先进文化，为的是强健自身的文化体魄，为的是提升岛国日本的文化地位，似乎这就是日本对华通好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也是古代日本对华外交博弈的最高利益选择。仿佛古代日本人只缘挥之不去的大陆文化情节而劈波斩浪跨海前来，甚至置生死于度外。对此笔者深不以为然。

固然双方的文化交流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交往中不无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还是占显眼的位置，但是它不可能涵盖中日关系史的全部。贯穿整部中日关系史的是双方政治博弈的过程，是各自利益的求取与获得的手段与方式不断变换的过程。虽然不同的历史